



『岩波新書』・日本近現代史 ⑤

從滿州事變 到日中戰爭

加藤陽子◎著 徐曉純◎譯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

出版說明

中國讀者對於與我們有著複雜情緣的鄰國日本，一直抱有高度的關注。尤其是進入近代以後，其發展軌跡與中國出現了明顯的差異——經歷了前近代國家向近現代的轉化、發展和崛起，對外的武力擴張並由此導致了戰敗。戰後的日本重新出發，社會政治體制發生了質的改變，在一九七〇年代一躍而成為世界上的第二大經濟體，而在近年又出現了長期的經濟低迷，整個社會在沉悶中孕育著躁動與不安。對於這樣的一段近現代歷程，日本人自己是如何來描述的呢？對於自己的近現代史，他們又是如何來認識的呢？這是廣大中文圈讀者所關切並抱有相當興趣的。出於這樣的目的，我們選擇了日本岩波書店近年（二〇〇六—二〇一〇年）來以「岩波新書」的形式陸續推出的十卷本「日本近現代史」，聘請了一批在此領域上頗有造詣的學者將其譯成中文，推介給各位讀者。

這套叢書的作者，大多是在日本近現代史研究上卓有建樹的學者或教授，他們運用

了既有的研究成果和相對完備的史料，力圖對日本近現代史的各個階段作出接近史實的描繪。這套叢書可謂是日本學者在這一領域內最新的系列性的研究成果，史料豐富，敘述脈絡清晰，問世以後在日本國內廣受好評，一版再版，很多都出到了十版以上。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儘管本叢書的作者都試圖秉持學者的立場，但其對許多歷史場景的理解、尤其是涉及與中國的部分，自然是以日本為本體，與我們的立場必然有差異，我們出版這套叢書，並不意味著我們認同原作者的觀點，而是為我們了解和理解一般日本人對於自己近現代史的認識提供一個較為完整的素材。

這套叢書在翻譯和編輯的過程中，對正文未做任何刪節。原有的插圖和大事年表，一概保留；原文中專門詞語的表述，一般均予以直譯（必要時譯者也會給予適當的解釋）；對原文中出現的重要的人名、事件等，譯者會以腳註的形式進行適當的註釋；對原著中的參考文獻，中文翻譯後再列出原文，以便有需要的讀者可查閱原文文獻；原著中的索引，考慮到對中文讀者的意義不大，略去不用。

目錄

緒論 10

第1章 滿州事變的四個特質 19

一、對手不在場 21

二、政治與軍人 25

三、事變的形式 34

四、不斷膨脹的滿蒙概念 39

第2章 圍繞特殊權益的攻守 49

一、列國是否承認過 51

| | |
|---------------|-----|
| 二、美國外交的目的 | 64 |
| 三、新四國借款團 | 69 |
| 四、非戰公約與自衛權 | 74 |
| 第3章 被突破的三個前提 | 83 |
| 一、兩種體制 | 85 |
| 二、張作霖時代的終結 | 102 |
| 三、國防論的視野 | 115 |
| 第4章 走向脫離國際聯盟 | 127 |
| 一、直接談判還是向聯盟起訴 | 129 |
| 二、在日內瓦 | 151 |
| 三、焦土外交的內裡 | 173 |

第5章 走向日中戰爭……………195

一、外交戰 197

二、兩起事件 224

三、沒有宣戰的戰爭 237

結語……………264

後記 270

參考文獻 272
大事年表 280

歐洲戰爭

一九四五年（昭和二十年）八月，經歷了空襲和原子彈爆炸的慘痛體驗的人們，面對往日熟悉的家園只留下一片廢墟的時候，日本的戰爭結束了。牧野伸顯^①的外孫、吉田茂^②的公子，精通英法文學的文學家吉田健一在比較歐洲人和日本人的戰爭觀時，曾經這樣說過，戰爭並不是離別親人奔赴戰場，亦或是由於原子彈的爆炸而使得人們瞬間或慢慢死亡，「而是一旦宣戰了，敵人隨時都可能出現在家門口，並且必須明白，這樣的事情是很自然的，同時也要做好自己的國家和本國的文明會消亡的思想準備」。〔《歐洲人民》〕

如此說來，對於歐洲人來說的戰爭，和對於日本人來說的戰爭，無論從實體上來看還是從記憶中來說，顯然都是不同的。除去傀儡國家滿州國^③、殖民地統

① 牧野伸顯（一八六一—一九四九），日本帝國時期的政治家，大正、昭和兩朝重臣，明治維新功臣大久保利通次子。——全書腳註均為譯者註。

② 吉田茂（一八七五—一九六七），日本前首相，是日本戰後最有影響力的政治家之一。

③ 本書中把「滿洲」寫作「滿州」，其理由在第一章第四節中有具體說明。

治下的朝鮮、以及沖繩等幾個例外（這些例外都迫使人們經歷了嚴峻而殘酷的體驗），對於大部分的日本人來說，戰爭不過是那些在遠離故土的地方發生的事件而已。

那是否算
作戰爭

政治思想家橋川文三一生都在研究「對日本人來說中國究竟是甚麼」，他曾經就日中戰爭^①提出過設問：「日本人是否將它視為戰爭？」現在我們或許可以重新關注一下這個問題吧。橋川在戰爭時期與日本浪漫派^②思想產生共鳴，戰後又為此深深感到懊悔，也只有他才會有如此出色的觀察問題的視角。

橋川這樣說道，一九三七年七月爆發的日中戰爭是一場奇妙的戰爭。戰爭在日中雙方都未宣戰的情況下持續進行。而另一方面，直到太平洋戰爭末期，日方都私下堅持著對華的和平工作。日本人究竟是否把它認作是戰爭呢？是否因為日中戰爭的本質和日方對於日中戰爭的認識之間的差異成為了一種致命傷，導致上

① 日中戰爭是指七七盧溝橋事變之後的日本全面侵華戰爭，下同。

② 以一九三五年創刊的《日本浪漫派》雜誌為中心形成的一個文藝派別，成員多為從左翼轉向的文人，後傾向於發揚日本古代文化、弘揚日本民族精神，戰爭時代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日本法西斯思想的傳播者。

至為政者下至國民在作出發動太平洋戰爭的判斷時都失去了理智？

橋川提出的以上問題，讓我們先前只能用「泥沼化」一詞將日中戰爭與太平洋戰爭連接在一起的僵硬頭腦產生了巨大的震動。（《專題論文集 日本歷史⑬ 法西斯與

戰爭》）

不是戰
爭，是

懲處

橋川本身沒有作出回答，但日本人是如何認識當時被稱作「支那事變」^①即日中戰爭的呢？這的確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京都的陽明文庫所藏的有關近衛文麿^②的文書中，有一篇題為《對當前時局的基本認識及其對策》（一九三八年六月七日）的史料。從內容上判斷，這篇推定由近衛首相的智囊團昭和研究会等學者執筆的史料中，可以窺見如下的日中戰爭觀：

「此戰爭的性質，並非領土侵略或以政治經濟利益為目的，而是為了排除阻礙日支邦交恢復的殘存勢力的討伐戰」。對華戰爭進行得如火如荼，卻把戰爭的性質表現為像是在討伐土匪。當然我們也要考慮到這篇史料是在連接華北與華中

① 支那事變為當時日本政府對於七七盧溝橋事變的舊稱，現在日本一般稱為日中戰爭。

② 近衛文麿（一八九一—一九四五），日本前首相，在他主持內閣期間發動了對中國的全面侵略戰爭。

的戰略要點徐州被攻陷後所寫的。

那麼，軍部是如何考慮的呢？我想從一九三九年一月中支派遣軍司令部編定的文件《揚子江開放相關意見》中來引出他們的日中戰爭觀。「此次事變並非戰爭，而是懲處。為了懲處而採取的軍事行動是被國際慣例所認可的」。這份文件強調了日中戰爭不是戰爭而是懲處這一觀點。那麼，「懲處」究竟有著何種意義呢？

懲處是法律用語中的報復的同義詞，被定義為為了終止、糾正國際不法行為而採取的強制行為。具體表現為對方國出現了違反條約的行為時，為了終止其行為，採用扣押對方國的貨物、船舶、佔領其部分領土等強制性行為。在這樣的情況下，此種強制性行為在法律上不算違法行為。

近衛的史料也好，中支派遣軍的史料也罷，均不是為了對外宣傳而撰寫的，而是面向內部的機密文書，因此可以認為昭和研究會的學者以及中支派遣軍的軍人們真的將眼前的這場戰爭看作是一場征討匪賊的戰鬥，是為了懲處與報復。

本書的

目的

當時，讓日本方面堅信不移、甚至不惜訴諸懲處和報復的手段也要阻止的中國方面的不法行為，究竟是甚麼呢？在橋川看來，日中戰爭使得日本的判斷能力失去了理智，以此為契機，日本人竟然不惜

挑起了太平洋戰爭。而這場日中戰爭，我們的祖輩竟然將其看作是一場討匪戰，是懲處，是報復。現在人們已經明白，日中戰爭起始於一次偶發性的武裝衝突。但是，這場戰爭的根源在於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由關東軍參謀策劃發動的滿州事變。

如此看來，我們可以推測，在製造滿州事變的階段，日本人的腦海裡已經有懲處、報復的想法了。事實也確是如此。李頓調查團^①在一九三二年三月訪問日本時，大阪商業會議所將以下備忘錄交給了調查團。即「滿州變亂之所以會引起（中略），是因為支那不尊重條約中所承認的日方權利，日本為確保其權利，作出了正當防衛，僅此而已」。

這份備忘錄也被李頓報告書的附錄所收錄。在附錄中，日本政府及工商業者報告了如下幾點內容：①中國抵制日貨的行為是非武力的敵對行為，我們認為這違反了非戰公約的第二條（不可為推行政策而發動戰爭）；②我們「真心地」相信日方採取報復措施是正確的。在李頓報告書的第七章中更是清晰地記錄了在調

^① 李頓調查團，由英國爵士李頓擔任團長的調查團，一九三二年受國際聯盟派遣調查日本在中國發動「九一八」事變而形成的滿洲問題以及中國的一般形勢，並完成了調查報告書。日本拒絕認同這份調查報告。

查過程中日本的工商業者認為抵制日貨行為是「侵略行為，主張日本應該為報復此行為而採取軍事行動」等事實。

當時日本的為政者及國民是緣何會從心底裡認為要對中國採取報復行動呢？筆者想對此一探究竟。筆者完全不認同將滿州事變、日中戰爭的原因歸咎於中國方面的違反國際法行為。相反，在以國際聯盟為舞台的論戰中，中國方面反駁道，正是為了抵抗日本的違法出兵行為才採取了抵制日貨的行動，中國的抵制是報復行為。這一主張也在國際聯盟大會通過的建議方案中得到了反映。中日雙方都主張對方實施了違反國際法的行為，自己採取的有力措施是正當防衛，因此不算違法。這就是一九三〇年代日本與中國的情形。

幾個問題

為甚麼會變成這樣？三十年代的危機是世界規模的經濟危機，也是英美蘇日等列國角逐的遠東地區的軍事危機。因此，將危機爆發的導火索滿州事變僅僅看作是日本為了阻止中國國家統一而採取的軍事行動是不全面的吧。

本書一方面將滿州事變的起源追溯到二十年代，必要時追溯到日俄戰爭時期。另一方面，也將敘述的時期向後定為一九四〇年十月，這一時間點日本成立

了大政翼贊會^①，而此時日中戰爭獨自解決的通道事實上已經被堵塞了。在本書的敘述中我想努力回答如下的問題。

① 滿蒙特殊權益是甚麼？② 圍繞兩個體制的角逐讓二十年代的中國有了怎樣的變化？③ 李頓報告書對日本的特殊權益論下了怎樣的判斷？④ 對於聯盟抱著強硬態度的內田外交的背後有著怎樣的理論邏輯？⑤ 一九三三年後，對日似乎轉為綏靖態度的中國所採取的戰略到底有著怎樣的內涵？⑥ 推進分離華北活動的日本方面究竟有著怎樣的意圖？⑦ 日中戰爭的特質究竟是甚麼？產生此特質背後的要因是甚麼？

在第一章，筆者將重點放在滿州事變形態的四個特質上，嘗試描繪出這個瞬間改變世界情形的事變的整體圖像。若能蒙您一直閱讀到後記，筆者將不勝榮幸。

本卷所記敘的時期從表面上看來和第四卷有所重合。但對三十年代的危機這

① 大政翼贊會，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的一個極右政治團體。於一九四〇年（昭和十五年）十月十二日宣告成立，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三日解散。該組織以推動「新體制運動」作為主要目標，在二戰期間，以一黨專政的模式統治日本。

部分，必須要從外交和軍事幾個方面來加以描述，因此難免會上溯到第四卷的時間軸。這一點，尚祈讀者的理解。

本書中對引述的史料若加作者註釋，用〔〕表示，參考文獻用（）表示，在卷末的參考文獻中按各章和刊行日期的順序予以記載。史料的出典，以便於閱讀為主，只做簡略的標記。史料中若無特別的標記，均出自《日本外交文書》（外務省編刊）。在引述的文獻中，會有一些以今天的眼光來看是帶有歧視色彩的詞語，鑒於歷史的背景，未做改動，請各位諒鑒。

第1章 滿州事變的四個特質



柳條湖事件發生後被佔領的北大營的航空照片，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九日
(每日新聞社)

一、對手不在場

四個特質

一九三一年（昭和六年）九月十八日晚上十點二十分，在中國東北（滿州）遼寧省瀋陽（奉天）附近的柳條湖，一部分南滿鐵路被炸毀。關東軍參謀石原莞爾^①等人終於實施了他們自一九二九年就開始精心策劃的作戰行動。

從歷史角度思考滿州事變時，人們總是會先思考這場事變為何會發生。這是因為從歷史因果關係的角度考察這場事變是很自然的，且是很重要的。

然而，例如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美國發生系列恐怖襲擊時，我們把這次恐怖襲擊稱為「史無前例的戰爭（war like no other）」，首先關注到它新的戰爭形態上。因為在試圖了解那些瞬間改變世界情形的暴力真相時，也許我們會本能地認為從它的「形式」角度切入是最合適的。再回到我們剛才的話題，其實主導滿州事變的石原本人，就是在日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際，對於戰爭形態

① 石原莞爾（一八八九—一九四九），日本軍人，先後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和陸軍大學，在關東軍任中佐參謀時，參與發動了九一八事變，且是偽滿洲國的炮製者之一。後升任參謀本部作戰部中將部長，一九四一年因與首相東條英機政見不合，被革除現役軍職，後任立命館大學教授，有著作多種。

的變化和特質有著最為縝密研究的人物。

因此，本章將闡明滿州事變所具有的形體上的特質，來作為本書整體的導入部分。滿州事變有著以下四個顯著的特質。①看準對方國領導人不在而發動的；②由原本不允許干涉政治的軍方主導的；③明知觸犯國際法，卻設法躲避因違反國際法而受到指責；④不斷擴展滿蒙作為一個地域概念的範圍。那麼，為何會選擇此種「形式」呢？另外，選擇了此種「形式」，滿州事變又會給日本社會帶來怎樣的變化呢？為了弄明白這些問題，我們首先從第一點來看。

當時的 兩個人

當時，蔣介石不在首都南京。蔣作為國民政府主席、海陸空軍總司令，無論在政治上還是軍事上都處於中國的最高位置。張學良也離開了他的根據地瀋陽。張是被稱為東三省（遼寧省、吉林省、黑龍江省）的東北地區實質上的領導人，身居東北邊防司令長官要職。

離開原本應該駐守陣地的這兩個個人，當時究竟在做甚麼呢？

事變發生之前，從一九三一年七月至九月，蔣介石率領了約三十萬國民黨軍，正對以江西省為根據地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發動第三次剿共戰爭。自上一年十二月的第一次剿共戰起，蔣介石率領的國民黨軍隊就陷入了苦戰。蔣直面的軍事威脅不

麼？事變前的張為了應對華北的石友三的部隊挑起的戰亂，正帶領其麾下的東北邊防軍（以下簡稱為東北軍）的十一萬五千名精銳位於被稱作關內的長城以南的華北地區。一九三一年八月四日被鎮壓的這場戰亂實際上是由日方特務機關買通了石軍挑起的。關東軍為了準備這場事變，特意事先安排將東北主力軍牽制在華北地區。（黃自進《滿州事變與中國國民黨》）

張學良由於在一九三〇年五月的中原大戰中沒有加入反蔣聯合部隊而得到了國民政府的感謝。因此，北平（北京）天津的衛戍司令、河北省政府主席等重要職位都由其黨派的人佔據，到了一九三一年，他開始著手將勢力從東三省擴大到華北的政治經濟領域。即便沒有石軍的叛亂，張學良留在東北的可能性也不大。而事實上，他並非在瀋陽，而是在北平聽到事變的消息的。

謀略的 深度

從以上過程來看，事變是趁著蔣和張離開根據地的時間點發動的。那麼為何必須要採取這樣的形式呢？

關東軍是在日俄戰爭後，為了守衛關東州以及保護滿鐵線而設置的軍隊。一九一九年四月，在廢除了武官制的關東都督府、設置了關東廳的同時，關東軍作為獨立的駐紮在滿州的軍事機關成立了。除了守衛鐵路之外，還逐漸利

用其軍事力量來強化對日本在滿州權益的維護、實行對蘇戰略等任務。（山室信一《怪獸增補版》）但是這支兵力在事變之前，只有從日本本土派來兩年輪換的一個駐紮師團和六個大隊的獨立守備隊，合計約一萬零四百名兵員。（江口圭一《十五年戰爭小史》）這個數量與東北軍的十九萬人相比，雙方兵力之懸殊可謂一目瞭然。

以當時關東軍的兵力想要在短期內壓制住整個滿州地區，就必須解決兵力懸殊的問題。而為了除去此心頭大患，就不得不考慮趁著張學良和東北精銳部隊離開老巢，蔣介石忙於剿共戰、對付反蔣聯盟這一時期發動事變。

二、政治與軍人

在公會堂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滿州事變的第二個特質，上文提及的②的部分，即由原本不允許干涉政治的軍人主導這一點。有一名青年，出生於石川縣，畢業於金澤第四高等學校，後於一九二四年進入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在參加了東大新人會活動後，加入了日本共產黨，因一九二八年的三·一五事件（在同年舉行的第一屆普選中，當時的田中義一內閣以治安維持法為名，鎮壓了作為勞動農民黨候選人而公然活動的共產黨的事件）被逮捕。保釋後為了



圖 1-2 一九二二年左右的石堂清倫（石堂清倫《我國異端的昭和史》上，平凡社博物館，二〇〇一年）

治療病弱的身體，那青年回到了故鄉石川縣。此時為一九三〇年左右。青年的名字叫做石堂清倫。（圖 1-2）

一天，路過小松町公會堂前的石堂看到平日裡在鎮上不太見到的被太陽曬得黝黑的農民們把公會堂擠得滿滿當當。入口處掛著「時局大演講會」的牌子，陸軍省派來的少佐正在進行演說。（石堂清倫《世紀的意義》）講壇上的少佐見識到了貧困底層的農村後，勸說大家為了脫貧必須下狠心採取一定的手段，他接著這麼說：

所謂的「左翼公會」要求土地平等分配，這的確是正確的主張，但即便把日本所有的耕地平等地分配給所有的農民，所獲得的額度也只有五反步（一反相當於大約九百九十二平方米）。接下來他提出了以下值得注目的煽動性的內容：

大家拿著五反步的土地，能把兒子送去中學念書嗎？能讓女兒讀上女子學校嗎？不行吧。（中略）日本土地狹小人口過剩。這個事實左翼沒有想到。因此，國內的土地所有制度就算徹底改革也改革不了。在這裡我們就必須把眼



圖 1-3 日本農民合作社大會（一九二六年七月，法政大學大原社會問題研究所藏）

光從國內轉向外部了。看看滿蒙的沃土吧。（中略）侵佔他人土地雖然不是甚麼光榮的事情，但在生死關口也顧不上那麼多了，就讓我們去拿下那片滿蒙的沃土吧。這樣算來，大家就不止五反步，而是一躍成為了十町步（一反的一百倍，大約相當於十公頃）的地主啦。大家都可以做東家了。

演說中的「左翼」是指勞動農民黨，「左翼公會」是指日本農民公會。之前只是由佃農發起以要求減免地租為中心的爭議，到了少佐發表演說的昭和經濟危機時期，變成了由地主主要求發起的收回租地、統一償還所欠地租，爭議的理由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由於經濟危機受到打擊的不僅是農村的佃農，地主也陷入窘境，圍繞土地引發了地主和佃農之間生死存亡的鬥爭。已經不只是地租的問題，而是上升到了土地問題。（圖 1-3）

在理解了這樣的背景後，再次細讀少佐

後記

以「常言道，人死留名，虎死留皮」作為開場白之後，後面往往可以接許多不同的句子來打趣。小松座劇團的内部雜誌《Eto.座》的總編小田豐二曾接道「獅王^①死留牙膏」。如果仿照這種說法，筆者這裡就是：沒寫成的一覽表就留到「後記」裡吧（目前還沒有死）。

《岩波書店的新刊》（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上刊登的《日本近現代史系列 全一〇卷》開始發行的說明文中寫道：「這是在顧及到家人^②、軍隊的實際情形及殖民地動向的同時，探究從幕府到現在的日本近現代歷程的新通史」。重要的是家人、軍隊、殖民地這三點。

以這個尺度來衡量的話，筆者寫的這一卷是不及格的。有關軍隊的部分寫得都要令人生厭了。有關殖民地部分，只在涉及到帝國內經濟秩序的時候提到一點，至於家人部分，連索引中都找不到吧。關於戰爭時代的家人家庭問題，由於

① 獅王，日本著名家化企業。

② 「家人」一詞的原文是「家族」，其基本意思包含了中文的「家庭、家人、家屬、家族」，可根據不同的語境作不同的理解。

這一領域中已有了許多出色的研究，筆者對於自己的無能感到慚愧。

沒寫成的原因在於，筆者沒有將家人家庭作為主語描述這個時代的能力和思想準備。我腦子裡怎麼也形不成這樣一個想法：「不是、家人家庭也很重要，而是家人家庭很重要」。藤井忠俊的《國防婦人會》正確地指出了日中戰爭的後方最大的特徵是女性的組織化。不能說戰爭也將女性組織了起來。從市町村的團體動向來說，這個時期有新組建或成員增加的，只有女性團體。應當說，正是戰爭將女性組織了起來。筆者無法超越藤井這個敏銳的視角。

此外，當父親、丈夫、兄弟、兒子為國捐軀，家人成為「遺屬」的時候，國家及當地社會是如何對待他們的呢？一之瀨俊也的《後方的社會史》，深入探討了戰前和戰後處理方式的差異、國家在遺骨的處理上所盡的責任等問題。筆者沒有超越這本著作的能力。有關家人家庭問題，請參閱上述兩本著作。筆者自身也繼續進行研究，期望能夠捲土重來。

最後，對於成功拽住了天馬行空的我並讓我愉悅地撰寫了此書的編輯部的上田麻里氏，謹表示由衷的感謝，確實給她添了不少麻煩。

二〇〇七年五月

加藤陽子